

语文现代化与语文教育*

李宇明

一、语文教育的含义与内容

(一) 语文教育中“语文”的含义

语文教育中“教育”的含义是明确的,“语文”的含义意见尚不一致。概括起来大约有四种理解: a) 指“语言文字”; b) 指“语言文学”; c) 指“语言文章”; d) 指“语言文化”。

认为“语文”指“语言文字”, 大约是因为: 1. “语文”本身包含有“语言文字”的意义, 如“国家的语文政策、《中国语文》、《语文建设》”等中的“语文”指的就是“语言文字”; 2. 代表着一种语文教育观念, 这种观念认为语文教学主要是语言文字的教学。

将“语文”理解为“语言文学”, 大约认为是认为“文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就语文教学的实践而言, 年级越高文学教学的比重越大, 课本中所选的文学篇目也越多; 1956~1957年大陆的中学语文教育改革试验, 曾经实行“汉语”、“文学”分科; 专门培养中学语文师资的高师中文系, 教研室和课程设置一般都分为“语言”、“文学”两大系统, 而且教研室、教师和课程的数量, 文学都要多于语言。有这些因素, 怎能不把“语文”理解为“语言文学”?

将“语文”理解为“语言文章”和“语言文化”, 大约与近几十年来文章学、文化学的发展有关。文章学和文化学的发展使一些学者认识到, 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文学固然很重要, 但是文学并不能涵盖人的语文能力, 不能包括其他文化知识。

以上这些理解的共同点, 是把“语文”中的“语”看作“语言”, 分歧在于“语文”中的“文”指的是什么。由于对“文”的理解不同, 也牵涉到对“语”的理解的差异: 理解 a) 中的“语言”不包括“文字”, 其他三种理解中的“语言”显然包括“文字”的内容。

要廓清“语文”的含义, 有必要看看“语文”形成的历史:

科举时代的私塾教育, 没有与今天的语文相对应的教学科目。清末废科举兴学堂, 开始设“国文”科^①, 课本中所选文章是文言文。随着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的开展, 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 1920年1月, 当时的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将国民学校(小学)的“国文”改为“国语”, 白话文正式进入课堂, 但小学以上仍是“国文”。1948年8月, 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 着手编写新的中小学语文课本, 时任编审委员会主任的叶圣陶先生负责起草《中学语文学科课程标准草稿》, 自此便有了“语文”一名。叶圣陶先生曾经明确指出, “语文”一名是在1949年下半年用起来的, “语就是口头语言, 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 就叫语文。”^②

就历史渊源上讲, 中小学教育中的“语文”是对“国语”和“国文”的综合, 指的是:

* 此文是作者在首届亚太地区中文教学研讨工作坊(2001年3月13日~15日·香港教育学院)的学术报告。

^① 于根元(1996, pp. 77~78)指出: “1905年停科举。1903年, 清政府在洋务派办学堂的基础上, 公布了张之洞等提出的‘学堂章程’, 其中有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 国文单独设科自此始。”

^② 叶圣陶《认真学习语文》, 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1980, p. 138)。

e) 口语和书面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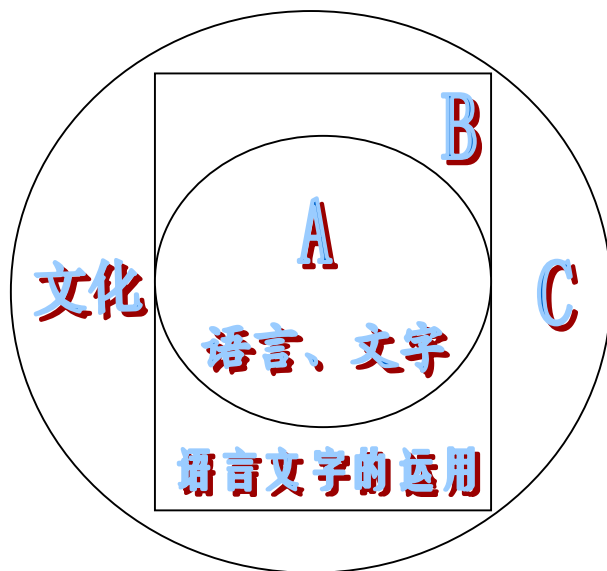
“语文”既然指口语和书面语，就应包括口语和书面语的载体——语言和文字，而且也包括口语和书面语的应用，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中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就此而言，“语文”的 e) 种含义包含了前面所说 a) ~c) 三种含义，与 d) 种含义非常接近，其间差异可能主要只在表述上。

(二) 语文教育的功能及其内容

语文教育的功能，有“工具说”和“载道说”之争。有人重视语文的工具性，认为语文教育主要是培养和提高学生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此谓“工具说”。有人重视语文的教化功能，希望通过语文来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也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素养和文学能力等等，语言文字只是基本功，只是使学生能够接受教化的“拐杖”，此谓“载道说”。

其实，“工具说”和“载道说”只是理论上的论证，只是在某种倾向发展到极端时才强调语文的另一个功能。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语文“政治化”的倾向十分严重，因此，文革之后有不少人重提语文工具说。就语文教育的历史来看，纯粹把语文作工具进行教学和纯粹不把语文作工具进行教学的现象，都是不大可能存在的，语文教育的“工具”作用和“载道”作用实难分割。一方面，无工具则无以载道；另一方面，语文不是单纯的工具，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内容必然含有道德观念、文化知识、文学等成分。“工具说”和“载道说”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罢了。

语文教育的功能与语文教育的内容密切相关。综合“工具说”和“载道说”，语文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A. 语言文字；B. 语言文字的运用；C. 语言文字及其运用所负载的文化内容（包括文学等）。如图所示。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用于交际、思维和文化录承的符号系统^①，这个符号系统由语音、语义、语汇、语法等子系统构成。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系统，具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特征。让学生掌握语言和文字这两个符号系统，是语文教育的基础性任务。但是，就中小学语文教育而言，让学生掌握这两个符号体系不是目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根据语言生活的需

^① 这里的“文化”是广义的，其外延是指人类的一切创造物，其中也包括人类可以支配、认识和欣赏的自然物。这里的“录承”的含义是“记录、传播、继承”。可参见邢福义主编（1990）和李宇明主编（2000）的有关论述。

要和语用规律, 很好运用口语和书面语进行交际及其他相关活动。因此, 语言文字的运用是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

语言和文字是人类创造和拥有的最为宝贵的文化财富。语言和文字是特殊的文化现象, 它们既是文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又是记录、传播、继承文化的符号系统。因此, 在语言、文字之中, 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之中, 都深深积淀着包括心理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内容, 不管是掌握语言、文字系统本身, 还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运用语言、文字, 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其中所积淀的文化。运用语言、文字的结果是形成口语和书面语(即一般所谓的“言语”), 口语和书面语的内容, 以更为显豁的方式表述着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化内容。学生在学习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述和理解时, 就是在学习文化和运用文化。所谓“文以载道”之“道”, 就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 语文教学离不开文化, 而且这里的文化是比“文学、文章”、传统所谓的“道”等的范围更为广泛。有意识的文化的教与学, 是语文教育在 A、B 两个层面上的拓展与提升。

语文教学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显然处于不同的层面: A 是语文教育的基础; B 是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 C 是语文教育的拓展与提升。当然, 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 这三个层面是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

二、百余年语文现代化对语文教育的贡献

(一) 语文现代化

语文现代化中的“语文”是指“语言”和“文字”, 与语文教育中“语文”的含义不同。狭义的语文现代化, 是指利用计算机进行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能够利用计算机进行语言文字信息处理, 除了计算机本身的技术之外, 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

a) 对语言文字的多种属性有了深入的研究, 而且可以使这些研究成果通过一定的技术“计算机化”;

b) 语言文字本身及其社会应用具有一定的规范, 如建立民族共同语而且民族共同语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 建立现代文字规范而且社会用字达到一定的规范化程度等等。

a) 是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内在直接条件, b) 是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外在保障条件。对于 a), 业界人士已经多有论述, 但却往往忽视 b), 其实, 在没有必要的语言文字规范的情况下, 在一种语言内部方言分歧非常严重、用字非常混乱的情况下, 是无法顺利进行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

这两个方面条件的实现, 显然非朝夕之功, 因此应当把语文现代化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 而不应看作一个静态的时间点段。利用计算机进行语言文字处理只是语文现代化在当代的标志, 语文现代化的进程早就起步了。

周有光先生认为, 语文现代化包括四个方面^①:

- a) 语言的共同化;
- b) 文体的口语化;
- c) 文字的简便化;
- d) 表音的字母化。

吴积才、冯志伟等先生, 都赞成周有光先生的观点^②。费锦昌等先生在周有光等的观点

^① 见王均主编(1995)的《前言》。

^②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 1998 年在昆明举行的第三次学术会议上, 也较多地涉及了这一问题。见苏培成主编(2000)的吴积才的《开幕词》、冯志伟的《闭幕词》。

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一条^①：

e) 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计算机化。

就本文的观点看，补充这一条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同意周、费、吴、冯等先生的看法，中国的语文现代化从清代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就已发轫，行进了一百余年的历程。

（二）改进语文教育

百余年的语文现代化，一个始终不渝的目标就是改进语文教育。例如：

切音字运动的先驱卢懋章，在《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中说：“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年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②

最早提出“普通话”这一词语的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后附的《附论各省音之变迁及举例》中说：“夫吾之所以望同胞者，能自立于生存竞争之世界耳。顾文字不易，教育总不能普及；国语不一，团结总不能坚固。”^③

著有《合声简字》的劳乃宣，在《进呈简字谱录折》中说：“是故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④

历史已经证明，在当时的条件下教育是不能救国的，当时中国教育的落后也不都是，甚至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语言文字的问题。且不论上述说法的时代局限性，单就先驱们希望通过语言、文字等的改革来改进教育的主张来说，是特别令人敬佩的。百余年的语文现代化的实践，对语文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语言共同化和文体口语化，解决的主要是语言问题。

语言共同化，主要是指确立和推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历史上的国语运动，50年代以来的普通话规范和推广运动，在其他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的配合下，逐渐确立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并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形成了共同语的规范。随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逐渐推广普及，沟通了方言区的交际隔阂，畅通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语言联系，并逐渐使教学有了统一的语言。文体口语化是从白话文运动开始的。白话文运动的狂飙，打破了文言文的一统天下，白话文取得了正统的地位，扭转了历史上形成的言文严重脱节的局面。而且，由于语言共同化和文体口语化，理论上说语文教学可以达到两个“一致”：学生口里说的同书本上写的一致，即“言文一致”；教师使用的教学语言与学生所要学习的语言都是现代汉语，即“教与学的语言一致”。

文字简便化和表音字母化，解决的主要是文字的问题。

文字简便化主要是指汉字在使用上要便利。汉字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出现了许多异体、异读、笔画繁难等不便使用的现象。对汉字进行整理、简化，使之便于应用，成为百年文字改革的主流。如清末开始的切音字运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文字拉丁化运动，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汉字简化实践，新中国进行的汉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文字简便化。当然，在百年文字改革中，许多改革者的目的可能是要使汉字拼音化。表音字母化主要是指用字母给汉字注音。在历史上给汉字注音的方法有直音、反切等等，比起字母来很不方便。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和汉语拼音方案等，都使汉字的表音实现了字母化。

^① 费锦昌主编（1997，p. 1）。

^② 文字改革出版社编（1958，p. 2）。

^③ 朱文熊（1906，p. 28）。

^④ 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p. 80）。“欲为易识之字”是否“非用拼音之法”，尚待历史说话，但前面所讲，实乃真知灼见。

百余年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工作, 对语文教育的贡献, 主要是帮助语文教育解决语言文字的问题, 亦即帮助解决的是语文教育的基础层面的问题。当然, 这些工作对语言文字运用层面和语文教育中的文化层面的问题也有帮助, 但是对这两个层面的帮助不是直接和主要的。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进行的汉语文信息的计算机处理 (又称计算机语言处理、中文信息处理等), 初步解决了字处理的问题, 在语言处理方面也有了重要进展。这些工作对当前语文教育的影响还不大, 但将来肯定会发生重大影响。

三、语文教育界的探索

(一) 语文教育的两个着力点

近百年语文教育 (包括早年的“国文”和“国语”) 成绩很大, 拙文不能对此全面总结, 只从上述语文教育的三个方面作以宏观的勾勒。

近百年的语文教育, 主要的着力点是解决 A、C 两个层面的问题。

在 A 层面上, 用力最多、收效最大的是小学的识字教学和中学的语法教学。例如, 为了解决小学阶段识字难的问题, 产生了一系列的识字教学法,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集中识字”、“分散识字” (随文识字)、“部件识字”、“字理识字”、“字族文识字”、“注音识字, 提前读写”等等。虽然这些识字教学法还需要继续进行试验, 需要在实验、推广的过程中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教学上的完善, 但是它们的出现与推广, 已经使识字这只语文教学的“拦路虎”不再“拦路”, 退一步说也是找到了降伏这只拦路虎的办法, 功莫大焉。

再如当年在中学阶段进行的“汉语、文学”分科试验。关于这一试验的设想, 早在 1951 年 3 月召开的教育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就已提出, 1954 年 8 月正式决定在中学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 开始拟订“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 并委托张志公先生主编《汉语》课本。1955 年秋分科实验在全国 79 所中学的初一年级展开, 1956 年秋试验在全国推开, 1957 年之后停止了试验。虽然“汉语、文学”的分科试验非常短暂, 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却奠定了中学语法教学的基本格局, 影响至今, 它的新时期的修订版“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 仍为当今中学语法教学所遵循。

C 层面涉及到语文教育的方方面面, 但主要体现在对课文的编选上。从总体上看, 课文的编选受社会思潮和政治观念的影响很大, 且有很重的文学情结, 但往往缺乏文化 (广义的文化) 上的审视。当前中国内地语文教育改革的呼声很高, 要求改革的内容仍属于 C 层面, 虽然仍是多从政治观念上提出问题, 但已向着文化的深层拓展, 如道德问题、修养问题、人格问题、语文素质问题等等。

(二) 语文教育的薄弱环节

由前面论述的语文教育的三个方面内容来看, 近百年的语文教育还存在着一些较为薄弱的地方, 概括来说有三方面:

第一, 重文轻语。虽然早在 1920 年就开始设置国语科, 几十年来要求重视口语教学的呼声从未中断, 但是重视书面语轻视口语的“重文轻语”痼疾, 仍然在语文教育中普遍存在。这种现象之所以成为“痼疾”, 与我国几千年的教育传统、与国人根深蒂固的重文轻语的语言观念、与当今的考试和用人制度、与对口语的科学研究不够等都有关系。

第二, 语言文字的运用是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 但关于语言文字运用的成体系有章法的教学, 几乎是空档。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就是根据交际需要、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妥当选用各种“语码”的能力, 而不是简单的“听、说、读、写”。语用学、社会语言学、修辞学

等对语言文字的应用规律都有一些探索,应当有人将这些学科的成果进行集成,并根据语文教育规律应用于语文教学。

第三,对语文教学中的文化问题,缺乏理性的审视和布局。语言文字及其运用所负载的文化内容,起着拓展和提升语文教育的重要作用。但是,这方面的教学缺乏“大文化”的思考,涉及的文化层面不全,文化之根不深。

除此之外,语文教学也同其他相关学科一样,重知识轻能力,素质教育虽然受到重视,但应试教育并未得到根本转变。这种“为知识、为考试”的语文教育,不仅对语文教育的实践有害,而且极大地妨碍着对语文教育规律的科学探讨。

(三) 信息时代的语文教育

世纪之交历来都是思考的历史关头,反思历史,谋划未来。这一类的优秀的反思和谋划,常能或明或暗地影响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20世纪的语文教育,告别了传统的“书院模式”和“私塾模式”,开始了现代教育的进程,为新世纪的语文教育打下了基础。新世纪的语文教育,除了继承上个世纪的成果,克服、弥补上面所言的不足之外,大约还必须考虑信息化的问题。

不少哲人都预言,21世纪是以“数字化”为特征的信息时代。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加强语文的信息教育,培养学生的语文信息能力,将是新世纪语文教育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之一。语文信息能力的基础是用计算机和其他设备输入语言文字,即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的现代化。如果说过去要求学好普通话、规范字和汉语拼音只是练好语文基本功的话,那么今天则是进入信息时代的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要求。语文信息能力除了信息输入的能力之外,还有信息的检索、传递、加工、储存等能力,这些都是过去语文教育不曾涉及或没有自觉涉及的新课题。

如前所述,语言文字现代化的第五个方面是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计算机化。作为语文现代化当代标志的语文信息处理,几十年来对语文教育的影响一直不大,但是随着社会的信息化进程,这方面对语文教育一定会发生重大影响。信息化与语文教育的问题,应是语言学界和语文教育界积极思考、合力探索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内地的语文教育改革,有轻视语言文字教学的倾向。业已进行的信息教育,与语文教育是不同的科目,无论是课程设计还是具体的教学活动,与语文教育都是“两张皮”。轻视语言文字教学的倾向和信息教育与语文教育“两张皮”的现象,可能会给语文教育带来较大的负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 陈必祥主编(1987)《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云南教育出版社。
 费锦昌主编(1997)《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语文出版社。
 李宇明主编(2000)《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苏培成主编(2000)《语文现代化论丛(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佟乐泉、张一清(1999)《小学识字教学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王建华(1993)《语用学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杭州大学出版社。
 王均主编(1995)《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
 文字改革出版社编(1958)《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
 邢福义主编(1990)《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
 许嘉璐(1999)《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于根元(1996)《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书海出版社。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1980)《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
 周光庆、刘玮(1996)《汉语与中国新文化启蒙》,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朱文熊(1906)《江苏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庄文中(1999)《中学语言教学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